

· 国际援助 ·

美国对中东援助的深层逻辑与实质

——以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土耳其项目为例*

李秉忠 刘 姜

内容提要 基金会是美国在全球扩展影响力的重要工具，其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助力美国确立全球霸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超强文化渗透能力的背后，是对西方文明的高度推崇，也是对所谓文明“高地”和“洼地”的划定。在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土耳其项目的逻辑是：形塑一个忠诚于西方的土耳其的前提是熟悉土耳其文化，尤其是伊斯兰教，改变的根本在于推广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尤其是通过资助“富有创造力的少数人”，以期使关键的少数人成为引领多数不可改变者的领袖。基于“文明优越论”，以文明为名，行改造之实，构成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土耳其项目的深层逻辑。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土耳其的最终指向，在于夯实土耳其的西方化发展道路，巩固其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忠诚，最终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利益。由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方向与土耳其既定的发展道路颇为吻合，因此，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土耳其的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中东文明的多样性和传统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决定了土耳其现代化探索必须以自身文化和传统为基础，这从深层次上决定了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土耳其项目的局限性和短暂性。

关键词 国际援助 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 土耳其项目 社会科学
人文学科 “文明优越论” 现代化道路

作者简介 李秉忠，陕西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姜，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黑海通史研究”（22JZD03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基金会被视作美国社会力量结构中区别于商人集团、政府权力的第三种力量，具有非营利性和相对独立于政府的特征。随着美国国际地位拾级而上，美国国内各种基金会迅速走向全球活动舞台，洛克菲勒基金会就是其中典型的代表。1913年，美国石油大亨约翰·D. 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在纽约正式创建洛克菲勒基金会，以“促进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的福祉”为其使命。该基金会的营运模式类似于组织化、制度化的企业，它并不向遭受疾病、贫困之苦的个体提供直接的救济，而是寻求以科学的原则系统地解决生理疾病和社会顽疾背后的“根源”。^① 依托洛克菲勒家族雄厚的财力支持，洛克菲勒基金会在20世纪20年代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慈善组织，公共卫生事业是其初期阶段深耕的主要领域。1928年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该年洛克菲勒家族名下的绝大多数慈善机构实现了整合重组，并加强了集中管理与统筹协调，由此开启了基金会发展的新纪元。改组后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可细分为五大部门：社会科学部、人文学部、自然科学部、医学教育部和国际卫生部。这一部门结构在此后的30余年内保持着相对的稳定，直至1963年被基金会第二次重大改组所打破。

美国私人基金会对国内政治和外交决策的影响力源自以下相互关联的因素：它们拥有大量可供管理人员分配的资本；将资本分配给文化机构中具有战略地位的某些个人和团体的能力，接收方的创作产出需符合基金会的世界观；与国家决策层的联系和融合；美国主导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既利己也利他这一共享的理念。^② 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例，该组织对于美国海外战略布局与实施的深度参与，体现为基金会与政府部门人员之间的流动性，^③ 以及通过独特的资金捐赠手段有力地辅助美国外交战略实践。慈善基金会在二战后构建起庞大的全球性知识网络，助力拓展了容纳世界知识精英的空间，但在这一空间内部，人员、知识和资金流动的体系都被打上了全球权力等级体系的

① Barbara Shubinski, “Evolution of a Foundation: An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https://resource.rockarch.org/story/rockefeller-foundation-history-origins-to-201>, 2024-07-01.

② Edward H. Berman, *The Influence of the Carnegie, Ford and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Ideology of Philanthrop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3, p. 38.

③ 20世纪50~70年代，共有3位洛克菲勒基金会高级官员成为国务卿，分别是1953年出任国务卿的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1961年出任国务卿的迪安·腊斯克（Dean Rusk）和1977年出任国务卿的赛勒斯·万斯（Cyrus Roberts Vance），基金会与政府部门之间频繁的人员交换可见一斑。See Edward H. Berman, *The Influence of the Carnegie, Ford and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Ideology of Philanthropy*, pp. 62-63.

烙印。最强大的国家，也就是最富有的基金会所在的美国在这一知识网络中毫无疑问处于金字塔的最顶端。通过学术捐赠这种“投资”形式，基金会明确地为全球智识生产指明方向，而知识精英们“总是被迅速吸引到智力罗盘的某个方位”。^①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美国权力在全球的拓展，洛克菲勒基金会也通过各种资助活动在世界各地打上自身独特的烙印，其资助的重点和份额也因时而变。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意味着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中东在新格局中的特殊地位使得美国迫切需要获取关于中东的相关知识以便更好地服务于其外交和相关政策的选择。洛克菲勒基金会迅速参与其中，扩大了对于中东的资助，尤其重视对于中东近现代历史、跨文化交流、中东文明史及其经济的研究。1948 年基金会年报写道：“近东^②乃地缘政治要害之地。其政治重要性已因近期事件得以凸显，然而西方对于近东思想和文化之重要性及深远影响，认识远不充分。”^③ 仅举一组数据便可窥见二战后基金会资助中东实践的强化：1913 年至 1952 年间，基金会资助近东项目的支出共计 5 451 195 美元^④，即平均每年为近 14 万美元；而从 1953 年至 1960 年，年度资助规划金额（含多年期项目）仅有 1955 年低于这一数字，^⑤ 金额最多的 1957 年（含多年期项目）竟高达 540 余万美元^⑥。在中东国家中，地缘战略价值不断凸显的土耳其，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长期的高度关注。洛克菲勒基金会围绕土耳其开展相关资助的逻辑和实践，与该基金会其他资助活动既具有共性，也有一定区别。20 世纪 60 年代之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土耳其的资助主要转向农业，对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资助迅速萎缩，因此本文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土耳其共和国建国到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一时期见证了美国与土耳其关系渐次走向蜜月期，同时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活动最为活跃、多样化、涉及范围最广的

① Inderjeet Parmar, *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The Ford, Carnegie, and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in the Rise of American Pow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61.

② 基金会年报曾长期使用“近东”（Near East）这一地理概念，二战后才逐渐为“中东”（Middle East）一词所替代。

③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48”, p. 279.

④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52”, p. 18.

⑤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55”, pp. 320 - 321.

⑥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57”, pp. 344 - 345.

时期，其时也恰逢西方现代化理论最为兴盛的阶段。^① 故，本文选择 20 世纪 20 年代至 60 年代作为本议题的研究时段。

一 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土耳其项目的特点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形式可分为两类：一是为特定项目向机构（通常是高校）提供赠款；二是向世界各地的学者、专业研究人员提供奖学金，以帮助他们完成特定课题的研究，基金会负担其赴欧美高校、研究机构深造、访问交流的费用。聚焦于土耳其一国，上述两种资助方式都有所体现，而具体资助领域可划分为医疗卫生、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三大领域。

（一）医疗卫生领域成为项目资助的切入点

在奥斯曼帝国晚期，洛克菲勒家族的全球慈善事业已经辐射到了土耳其，此时的援助主要用于传教和救济活动。约翰·洛克菲勒曾为浸礼会在奥斯曼帝国的传教和救济提供支持，他和其子小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Jr.）也为一战后希腊、亚美尼亚难民提供了救济支持。早在 1915 年，就有美国医学工作者出于移民导致传染病肆虐会对西方文明产生威胁的担忧，敦促基金会关注土耳其的公共卫生状况。^② 但直到 20 年代土耳其政治、社会局势趋于稳定之后，这项工作才逐渐铺展开来。1922 年 8 月，基金会派遣专员赴君士坦丁堡进行实地考察。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基金会在土耳其的活动越发活跃，主要集中于公共卫生、医学教育领域。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土耳其获得基金会资助的 44 项奖学金中有 33 项属于公共卫生领域。基金会的医

^① 关于该问题的研究，直接相关的成果并不多，较典型的有《美国和现代土耳其的形成》，该书对于土耳其共和国立国到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在土耳其开展的慈善事业进行了系统梳理，包括对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相关材料的梳理，被认为是国际学术界首次对这一被忽视主题的系统梳理，对于土耳其与美国关系史、土耳其知识分子史和土耳其政治研究都做出了贡献。这一时期土耳其拥抱西方化道路，与此相伴的是对于科学和现代的追求取代了传统和宗教的话语，后者被认为与落后和自大关系密切。包括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内的相关机构在塑造土耳其西方化道路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See Ali Erken, *America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Turkey: Science, Culture and Political Alliances*, I. B. Tauris, 2018; Murat Erdem and Kenneth W. Rose, "American Philanthropy in Republican Turkey: The Rockefeller and Ford Foundations", *The Turk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sue 31, 2000; Ali Erken,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John Marshal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ities in Modern Turkey: 1950 - 1965", *Divan: Disiplinlerarası Çalışmalar Dergisi*, Cilt 20, sayı 38, 2015.

^② Alden Hoover, "The Status of Preventive Medicine in Turkey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Control of Epidemics", <https://doi.org/10.17077/etd.fcv39hmu>, 2024 - 07 - 02.

学教育部对土耳其的医学院建设情况进行了考察和研究，于 1924 年编写完成了《土耳其医学教育》报告。1925 年，医学教育部资助了 3 名土耳其青年医学研究人员赴外国深造。^① 1926 年，基金会国际卫生部的拉尔夫·科林斯（Ralph K. Collins）博士赴土调研，并撰写了关于土耳其公共卫生的报告。1928 年 5 月 27 日，得益于基金会资助，中央卫生研究所（Central Institute of Hygiene）在安卡拉落成，标志着土耳其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的设立迈出重要一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中央卫生研究所的建立和发展投入 28 万美元，该研究所设有 4 个科系：流行病学与统计学、卫生工程学、寄生虫学和社会卫生学。^② 1936 年，公共卫生学院（School of Public Health）成立，科林斯成为首任院长。科林斯在土耳其一直工作到 1940 年，成为这一时期指导基金会在土耳其活动的主要官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洛克菲勒基金会继续资助土耳其卫生医疗机构，其效益与影响亦相当可观。此时的资助重心转向医学研究和教育，较为重要的机构包括安卡拉大学儿科诊所等。1957 年，安卡拉大学儿科诊所正式开业，标志着土耳其现代儿科临床、教学和研究服务的诞生，这“有助于在土耳其和整个中东地区建立新的医学教育模式”。为助力该诊所进一步发展，洛克菲勒基金会向安卡拉大学拨款 14.5 万美元，其中 11.5 万美元用于购买设备和相关用品，其余经费用于延请专家和客座教师。^③ 1956 年至 1961 年，该诊所收到了 30 多万美元的资助。安卡拉大学的其他医学教育院所也收到了基金会的大笔资助，如 1962 年为新成立的护理与健康科学学院提供 11 万美元以支持为期三年的教育项目。^④

此外，土耳其著名儿科专家伊赫桑·多拉马哲（İhsan Dođramacı）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高度重视，在 1956~1967 年间他主持、参与的各项项目获基金会的资助达 100 余万美元。^⑤ 在多拉马哲的领导及基金会的大力资助下，

① 以下关于洛克菲勒基金会年度报告，参见该机构网站：<https://www.rockefellerfoundation.org>。“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25”，p. 400.

②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35”，p. 59.

③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60”，p. 96.

④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62”，p. 135.

⑤ RFA, RG 1. 2, Series 805, Box 3, Folder 21 and Boxes 4 - 5, Folders 32 - 44, quoted from Murat Erdem and Kenneth W. Rose, “American Philanthropy in Republican Turkey: The Rockefeller and Ford Foundations”, *The Turk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sue 31, 2000, p. 141.

哈杰特佩医学院 (Hacettepe Faculty of Medicine) 等在医疗卫生领域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机构, 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1964 年, 基金会为哈杰特佩医学院的发展资助了 22.5 万美元。^① 与此同时, 不少年轻有为的医护人员在多拉马哲的引荐下凭借基金会的奖学金赴美国深造, 并在回国后加入多拉马哲的团队。在 1962 年的年度报告中, 基金会称赞多拉马哲领导下的安卡拉大学医学院儿科学系是土耳其国内的“示范单位和样板”, 鉴于该学院约有 10% 的学生来自其他中东国家, 因而也是整个中东地区的“示范单位和样板”。^②

(二) 社会科学领域成为新宠

如果说医疗卫生领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土耳其活动的最初窗口, 那么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 社会科学研究则成为一系列资助项目的新宠儿。1951 年, 洛克菲勒基金会会长福斯迪克 (Raymond Fosdick) 在年度报告中强调, 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勾连起经济学、人口学和社会学等不同研究领域。在这 20 年间, 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奖学金授予数占奖学金总数的 35.5%。^③ 该基金会围绕区域国别研究建构的资助模式也趋于完备、成熟, 除了通过奖学金和赠款资助对象国的个人以及机构外, 还包括资助美国相关院校和研究机构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区域国别研究在这个时期的美国甚为兴旺, 洛克菲勒基金会则是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推手。基金会为土耳其社会科学领域的资助拟定总框架, 其大力资助使得土耳其的社会科学研究迅速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基金会的资助下, 土耳其—美国大学协会 (Turkish - Americ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于 1953 年 7 月举办亚洛瓦会议 (Yalova Conference), 进一步凸显了土耳其的特殊地位和基金会对于该国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视。

亚洛瓦会议的目的是探讨彼时的土耳其有哪些社会和文化问题与土耳其其发展道路相关, 据此制订相应的研究计划。参会人员包括许多土耳其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及欧美院校的学者, 他们共同研讨了土耳其的社会科学研究状况。土耳其—美国大学协会主席、伊斯坦布尔大学前校长厄梅尔·萨尔杰 (Ömer Celal Sarc) 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 美国对于土耳其及土耳

①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64”, p. 139.

②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62”, pp. 134 - 135.

③ Kenneth W. Rose,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Fellowship Program in Turkey, 1925 - 1983”, Paper Prepared for a Symposium on “The First Turks in America”, held at Yeditepe University in Istanbul, January 4, 2003, p. 13.

其研究愈发浓厚的兴趣出于理解土耳其经历的独特的文化革命之世界性意义这一目的。土耳其选择了完全拥抱西方文明，包括意识形态和科学技术两方面，而许多不发达国家在选择何种道路方面仍犹豫不决，土耳其的道路可资借鉴。^① 亚洛瓦会议赋予土耳其道路以某种样板的意义，理解这一样板的核心则是土耳其革命及其对西方化政策取向的坚持，这也很好地诠释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关注的核心所系。参会学者谈论了“土耳其革命”中的经济问题、农村问题、世俗主义与宗教信仰问题、女性问题等诸多议题，虽然研究旨趣、关注点各异，但他们达成了共识：“土耳其革命”值得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进行研究，以便作为西方化发展道路的模板，更好地为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国家所理解。^②

对经济史的研究被视作理解一国发展道路的基础，因此土耳其经济研究获得了基金会的格外青睐。土耳其经济被认为既没有遵循美国的政府最低限度干预模式，也没有遵循苏联的中央计划模式。伊斯坦布尔大学厄梅尔·巴尔坎（Ömer Lütfü Barkan）教授长年致力于研究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和社会史，该研究有助于土耳其和西方更深入地理解该国彼时快速发展和经济变革背后的经济史因素。^③ 1956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向伊斯坦布尔大学拨款3万美元，以助力巴尔坎教授继续推进学术研究。另外，安卡拉大学的公共财政研究所所在所长苏尔（Fadıl Hakkı Sur）教授的指导下，系统收集相关经济数据并据此分析1923年以来该国的生产和消费趋势，该项目获得了基金会2.5万美元的资助。^④ 由罗伯特学院（Robert College）研究人员和土耳其经济学家合作编写的关于土耳其经济发展的英文版教科书也于1961年出版。该教科书由西方学者执笔，土耳其本土经济学家组成咨询委员会提供指导，体现了将西方学术范式与本土视野相融合的合作研究思路。

美国本土的土耳其研究同样在战后迎来了学术增长的黄金时期。若要论及所掌握的土耳其研究相关材料的丰富程度，胡佛研究所的图书馆堪称首屈一指，时任土耳其总统拜亚尔（Mahmut Celal Bayar）直言，该图书馆馆藏的

①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on Problems of Research in Turkey”, in RFA, Rockefeller Foundation Records, Projects, SG 1.2, Subseries 805. R, Box 9, Folder 96.

② Ali Erken, *America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Turkey: Science, Culture and Political Alliances*, p. 101.

③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56”, p. 202.

④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59”, p. 192.

部分珍贵材料即使在土耳其国内也难寻踪迹。^① 基金会数度资助土耳其学者赴胡佛研究所利用馆藏资源开展研究。1946年，罗伯特学院和美国女子学院的前校长小沃尔特·赖特（Walter L. Wright Jr.）加盟普林斯顿大学，成为北美地区第一位土耳其历史专业教授。赖特在普林斯顿大学开设近东研究项目，讲授土耳其语暑期课程，并延请学者教授土耳其语和土耳其历史的研究生课程。赖特去世后，刘易斯·托马斯（Lewis Thomas）接替其继续推进奥斯曼帝国与土耳其历史研究，普林斯顿大学成为美国的土耳其研究重地。洛克菲勒基金会年度报告中将该校誉为“美国为数不多的专注于伊斯兰文明现代阶段的大学之一”，是“海外工作急需的训练有素之人员的主要来源，也是美国其他学院和大学当代近东研究的主要发源地”。^② 基金会早在1937年和1939年就开始资助该大学，意在推动土耳其历史和语言的深度研究。1946年基金会拨款4.25万美元用于该校建立近东研究项目（Program in Near Eastern Studies），1952年又拨款10万美元以扩大对近东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研究。1954年，基金会向普林斯顿大学提供50万美元的高额资助，足见对于该校近东研究的重视。美国的土耳其研究与土耳其本土研究力量之间开展了多种合作，互动频繁。

（三）人文学科开始获得重视

洛克菲勒基金会重视资助人文学科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教训密切相关。战后基金会人文学部以增进国际理解为宗旨，加大了对人文学科资助的投入。“跨文化理解”尤被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间的边界正变得不那么重要和危险，但文化间的边界仍继续存在，如果不同文化相互间的理解以失败告终，它们就会成为相互对立的思想和愿景之间爆发冲突的边界，成为对他人情感上敌意的来源。”^③ 大卫·史蒂文斯（David Stevens）于1932年成为基金会人文学部的第一位专职主任，他更倾向于助力年轻而富有潜力的学术新秀们成长，具备“个人潜力”和“机构地位”优势的艺术家、历史学家和人文学家得到基金会的特别关注。

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是在“近东”研究资助活动中起到举足

^① “Eleanor Bisbee to John Marshall, 1 November 1954”, in RFA, Rockefeller Foundation Records, Projects, SG 1.2, Subseries 805 R, Box 10, Folder 97.

^②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52”, p. 274.

^③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54”, pp. 48 - 49.

轻重作用的人物。从1933年到1958年，马歇尔在人文学部历任助理主任和副主任，他也是该部第一位访问“近东”地区的职员。1948年马歇尔首访“近东”地区，1950~1951年再度访问土耳其。此后他频繁访问土耳其，结识了诸多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学者和艺术家，同众多院校、组织机构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土耳其“大展拳脚”的背后，马歇尔的设想和谋划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土耳其政府也认为马歇尔的作为对该国助益良多，于1956年授予他伊斯坦布尔市奖章（Medal of the City of Istanbul）。^①

在增进“国际理解”的口号下，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学部鼓励美国的院校大规模开展对外国语言、文化的研究。基金会致力于寻找一种途径，将当地的价值观融入西方的艺术和人文模式之中。^②“跨文化理解”是基金会资助土耳其人文学科研究所遵循的关键原则。为促进土耳其国内的美国研究，基金会投入了相当的财力。安卡拉大学和伊斯坦布尔大学都设立了美国历史及文学研究的教职。这一计划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鲜有土耳其人有能力承担此类教职，因此只能短期聘用外籍学者。基金会于1953年为安卡拉大学提供了2.1万美元的资助，用以在此后数年间聘任美国教授讲授美国文学和历史。基金会还向安卡拉大学的教职人员提供资助，以鼓励他们通过在美国学习和旅行来获得第一手的美国知识。^③

罗伯特学院是基金会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倾力资助的土耳其院校之一。该学院于1863年由传教士塞勒斯·哈姆林（Cyrus Hamlin）在伊斯坦布尔创建，是美国在海外创办的第一所大学。最初由于其带有基督教性质，学生群体几乎全部由奥斯曼帝国境内少数族裔组成。一战中，美国与奥斯曼帝国分属不同阵营，这给学院的办学带来了不小的冲击，所幸在学院领导层的奔走下，罗伯特学院并未遭到取缔。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罗伯特学院不仅得以继续运转，而且还从这个新生国家的社会文化变革进程中嗅到了发展的良机。越来越多来自官员、知识分子家庭的孩子进入罗伯特学院求学，一些政府部

^① Sarah - Neel Smith, *Metrics of Modernity: Art and Development in Postwar Turk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22, p. 144.

^② Ali Erken, *America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Turkey: Science, Culture and Political Alliances*, p. 120.

^③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53”, pp. 285 - 286.

门也开始向其输送生源，就连土耳其总统凯末尔也决定将两个养女送入该学院，以便她们提升英语水平、熟悉美国的风俗和文化。^① 学院的毕业生在政治、外交圈颇得青睐，1945年联合国制宪会议上，土耳其、叙利亚、伊朗三国的代表都是罗伯特学院的毕业生，土耳其驻联合国首任大使也毕业于罗伯特学院。^② 二战后，罗伯特学院的建设定位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色彩，这是美国冷战全球战略与思维加持的结果。在长期任罗伯特学院人文系主任的大卫·加伍德（David Garwood）看来，罗伯特学院的建设定位既不是教会学校，也不是土耳其民族主义教育体系下的机构，而是土耳其和美国共同愿景的产物，^③ 反映了罗伯特学院的地位转变：从教育机构转变为维护美国在近东利益的战略站。^④ 196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发生后不久，军人出身的国家元首古尔塞勒（Cemal Gürsel）造访了罗伯特学院，重申了土耳其在推行西化政策方面的承诺，并赞扬了土耳其与美国的伙伴关系。^⑤

冷战时期，美国的政治精英们认为，“人文学科、媒体和教育是促进美国价值观而非社会主义原则大行其道的最可行手段”，从洛克菲勒基金会对罗伯特学院的具体资助活动来看，大抵即是这一战略思维的逻辑结果。该学院的授课方式在美国很常见，但在中东地区颇具创新性：小班化、轻松的师生关系、重视人文学科。^⑥ 罗伯特学院的教研人员同美国、英国的学者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一道，编写教学大纲和东西方文化关系研究的参考书目，还将东方传统经典著作汇编为资料集，包括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资料翻译成英语，将奥斯曼土耳其语的资料翻译成现代土耳其语。

为解决合格的教研人员长期缺乏的问题，罗伯特学院倡导吸纳土耳其本国青年人才进入教研队伍。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资助支持土耳其本土科研人才赴英美深造，其后以西方国家院校毕业生的身份加入罗伯特学院。通

① John Freely, *A History of Robert College*, Istanbul: Yapı Kredi Yayınları, 2009, p. 22.

② Ibid., p. 89.

③ David Garwood, “An Experiment in Bilingual, Bicultural Education”, *Liberal Education*, Vol. 48, 1962, pp. 1–11, quoted from Ali Erken,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John Marshal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ities in Modern Turkey: 1950–1965”, p. 133.

④ Ali Erken, “The Making of Politics and Trained Intelligence in the Near East: Robert College of Istanbul”, *European Review of History: Revue européenne d’histoire*, Volume 23, Issue 3, 2016, p. 9.

⑤ Ali Erken, “The Making of Politics and Trained Intelligence in the Near East: Robert College of Istanbul”, p. 11.

⑥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56”, p. 252.

过这种方式，罗伯特学院既加强了同所在国的联系，又维持着教学传统中鲜明的西化特征。^① 经过西式教育，学院的学生将“获得一种特征、观点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使他们在土耳其的公共和私人生活中成为一股与人数完全不成比例的积极力量”。^② 1956年，基金会向罗伯特学院资助35万美元，用于在十年内培训土耳其本土人员担任该校和美国女子学院的教员。

美式高等学校不仅仅代表着美国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更是美国促成土耳其改变的重要教育和文化阵地，具有极强的示范性功能。凭借着“在塑造新一代方面无可比拟的作用”，伊斯坦布尔的罗伯特学院和于斯屈达尔（Üsküdar）的美国女子学院在土美文化关系中扮演着突出的角色。^③ 两校的毕业生不仅接受了高水平的教育，而且为西方的价值体系所濡染，且多有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占据关键职位者，成为助推土耳其全方位融入西方世界的重要力量。

除了传统的研究领域外，人文学部还持续探索戏剧、音乐、广播、微缩摄影等诸多项目。马歇尔认为，艺术表达是人文实践中最能直击受众感知的表达方式，有助于西方文化及价值观浸染土耳其社会大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同样契合土耳其共和国致力于实现戏剧和音乐“现代化”的愿景，由此艺术领域出现了土耳其元素与西方元素相融合的趋势。交响乐、芭蕾、歌剧等西方艺术形式在该国一时蔚然成风。针对土耳其的剧院和音乐学院缺乏优良设施设备的困境，基金会专门拨款以鼓励这些艺术机构的发展。例如，1957年，为使伊斯坦布尔交响乐团能够在海外采购乐器和音乐设备，基金会向伊斯坦布尔市立音乐学院拨款4万美元。^④ 人文学部还致力于发掘年轻有为的土耳其本土艺术家们，并通过奖学金资助鼓励他们赴美国等西方国家交流访问、深造，从而得到西方前沿理论、流派的熏陶。其中较为突出者如通奇·亚尔曼（Tunç Yalman），马歇尔认为他在剧作领域前途不可估量，因而为其提供了一笔奖学金支持其赴美国剧院观摩学习。通奇·亚尔曼在国际舞台上

①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56”, p. 253.

② Murat Erdem and Kenneth W. Rose, “American Philanthropy in Republican Turkey: The Rockefeller and Ford Foundations”, p. 139.

③ Cangül Örnek, “From Analysis to Policy: Turkish Studies in the 1950s and the Diplomacy of Idea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8, No. 6, 2012, pp. 948–949.

④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57”, p. 253.

也非常成功，尤其是穿梭于美国和土耳其之间。^①基金会还关注到了一些土耳其传统艺术形式的新发展，如芙蕾雅·科拉尔（Füreya Koral）作为土耳其闻名的陶瓷艺术家，受到了马歇尔的赞赏，认为她将以“现代风格”复兴这一传统艺术。^②

二 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土耳其项目的深层逻辑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土耳其的资助几近停滞，但在战争结束后，基金会的资助活动快速恢复，并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高峰。自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基金会授予土耳其人的奖学金中有近40%是在50年代发放的，而五六十年代授予的奖学金占到了57%。^③此时期基金会资助土耳其项目的活跃，是冷战背景下美国与土耳其正式缔结战略同盟关系的重要注脚。

二战结束后，土耳其与美国关系日益密切，美国日渐认识到土耳其在对抗苏联方面不可或缺的地缘战略价值：土耳其可以充当美国在中东打下的一根楔子，以及抵御苏联扩张的欧洲“桥头堡”。对抗苏联这一共同目标促使土美关系发展迅速。1947年7月，美国与土耳其正式签署《关于援助土耳其的协定》。次年，两国又签署协定将土耳其纳入马歇尔计划。此后，数十亿美元的经济、军事等各类美国援助流向了土耳其。1952年土耳其加入北约是美土两国正式建立起战略同盟关系的界标，土耳其成为西方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的宠儿。土耳其的与众不同不仅在于同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还在于建国后凯末尔领导的“西式现代化”发展道路。西方（欧洲）国家身份是土耳其孜孜以求的国家身份，西方化也是其内政和外交的主色调。洛克菲勒基金会官员马歇尔曾在报告中着重论及了土耳其相比于其他中东国家，西方化进程相

^① Hasibe Kalkan, “On the Role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in Establishing Theatre Education Programmes and Transnational Theatrical Spaces in Turkey during the Cold War”, *Journal of Global Theatre History*, Vol. 4, No. 2, 2020, p. 48.

^② “Füreya Koral, 1956 – 1957”, in RFA, Rockefeller Foundation Records, RG 1.2, Series 805 R, Box 7, Folder 69, quoted from Ali Erken, *America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Turkey: Science, Culture and Political Alliances*, I. B. Tauris, 2018, p. 131.

^③ Kenneth W. Rose,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Fellowship Program in Turkey, 1925 – 1983”, p. 13.

对成功：伊斯兰教力量得到了有效压制，政府实现了对宗教人士的管控，建立神学院培养新一代神职人员；民众对于国家领导人摹画的西方化发展道路较为认可；学术研究环境以及同外国的知识交流较为良好等。在基金会看来，土耳其的西化改革进程赋予其迥异于其他近东国家的某些“欧洲”特性，西化改革催生了土耳其国内亲西方精英的发展壮大，而其他近东国家仍存在相当程度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可能性。^① 土耳其正是一个绝佳的“试验田”，是展示西方化成效，并推动西方化向着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发展的对象。尽管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活动多以科学、理性、进步为旗帜，然而究其内里，美国特殊的意识形态考量占据了核心地位。以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土耳其医学卫生、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为例，同样存在某种文明维度的深层逻辑——以文明之名，行改造之实。

（一）培养医学界新的领导者以传播“文明的益处”

就洛克菲勒基金会早年着力耕耘的医学科学事业而言，其动机并非如料想中的那般纯粹。恰如在192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落成典礼上，小约翰·洛克菲勒致辞称，北京协和医学院“不仅在医学科学方面，而且在心理发展和精神文化方面”可提供西方文明的最佳成果。^② 其立意不在于传播西方科学技术本身，而在于所谓的“发展科学繁荣的环境”。环境的革新则在于移风易俗，在于西方价值观念的移植。这种文明“高地”与“洼地”的分野，在另一个东方国家土耳其身上也得到了印证。

奥尔登·胡佛（Alden Hoover）作为一名医疗传教士在奥斯曼帝国工作了8年，并于1915年撰写了报告《土耳其预防医学的现状：尤以流行病控制为例》，对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土耳其公共卫生领域的早期实践有很大启发。他在报告中将土耳其落后之因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孱弱关联起来，“土耳其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存在现今受到严重威胁，主要是因为它忽视了这些文明法则、公共和个人福利法则，而正是这些法则造就了健康、自足和进步的民众。”^③ 胡

^① “John Marshall, The Near East 1951, 13 November 1951”, in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rchives (RFA), *Rockefeller Foundation Record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and Policy*, SG 3.1, Series 911, Box 2, Folder 15, pp. 20–21.

^② Frank Ninkovich,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China, and Cultural Change”,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70, No. 4, 1984, p. 803.

^③ Alden Hoover, “The Status of Preventive Medicine in Turkey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Control of Epidemics”, p. 2.

佛将医疗服务、幸福、发展和文明相互联系起来，并得出结论：如果土耳其人能够过上更加健康的生活，就将萌发对于“文明”的渴望，这个国家便能实现复兴。^① 既然确定了改变的目标是学习西方的文明，那么就需要确定改变所依靠的力量和采取的路径。与此类似，基金会医学教育部主管理查德·皮尔斯（Richard Pearce）则在1924年撰写了题为《土耳其的医学教育》的报告，该报告阐明了西化精英阶层乃是改造土耳其的依靠力量，而路径则在于对这一群体施加西式的教育和培训并助力其壮大。皮尔斯认为，土耳其较早地开启了“通过融合东方生活原则不断吸收西方思想的过程”，^② 具有某种天然的优势，“土耳其人是东西方思想和文明之间的天然纽带，特别适合在不同族裔和思维方式的东方邻国中传播适合东方人的西方思想的产物”，^③ 然而现实却是广大群众对西方化的潮流仍然反应迟钝，对西方在其国家的活动包括教育领域的活动持怀疑态度。由此皮尔斯提出，预期的“进步”可以通过“受过教育的文化阶层”的活动来实现，他们可以通过西方教育和培训将对精神和传统的理解结合起来。^④ 皮尔斯报告的这一思路在基金会资助活动中得以付诸实践。

在资助实践中，基金会特别强调受助国本土医护人员的培养，使之成为引领本国医学事业革新的领导性力量。从1925年到1940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向来自土耳其的医生和护士提供了30多份奖学金，他们大多受邀赴美国学习、培训。^⑤ 在基金会官员看来，对于本土医护人员的资助要比资助本土的医疗机构更具深意，经历过合格培训的医护人员在回国后很大概率能够利用其优势地位和影响力，将先进的医疗知识、经验借助本土化教育进一步传播开来。现代医学所承载的实证主义、科学主义、进步主义等思想理念，必然会对基于宗教传统的保守价值观、世界观形成巨大的冲击，进而将西方精英引以为傲的理性、科学精神，移风易俗式地注入受资助国的社会，从而实现深

① Alden Hoover, “The Status of Preventive Medicine in Turkey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Control of Epidemics”, pp. 107 – 108.

② Richard Pearce, “Medical Education in Turkey”, in RFA, Rockefeller Foundation Records, RG 1.1, Series 805, Box 1, Folder 4, p. 76.

③ Ibid.

④ Ibid.

⑤ Ali Erken, *America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Turkey: Science, Culture and Political Alliances*, p. 36.

层文化特质的改变。由此，在土耳其建立一个基于西方科学标准的全新医疗建制成为一个关乎“文明”的问题。正如传教士投身于传播基督教文明的福音，许多参与基金会项目的医疗卫生专业人员同样将自身的工作视作将“文明的益处”带给“落后”的民众。^①“西方文明优越论”是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实践中潜藏的底层逻辑，即便是包括医学在内的科学事业也暗含了“科学在西方，西方的制度环境才能造就科学”这样的判断。由此可见，这种“文明优越论”设定了西方生产科学，西方掌握科学话语权，西方的科学承担着改造非西方世界的使命，包括对于非西方世界的移风易俗。西方根深蒂固的等级化的文明认知，导致了其对非西方世界的歧视和无知。

（二）培养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富有创造力的少数人”以促成社会内部变革

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洛克菲勒基金会对对象国个人、机构的资助同样暗含了这样的逻辑：对象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应当熟悉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规范并以之为模板。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帮助受过教育的精英在公共管理和社会生活中应用社会科学方法。^②20世纪50年代，基金会对于土耳其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经济研究的关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双方各自的需求。土耳其开启民主政治实验后，民主党于1950年通过选举胜利上台执政，大力推行经济自由化政策。随着外部援助尤其是美国的援助大量流入，土耳其的经济发展方向深受美国经济理论的指导和影响，学术上的热潮是经济上仰赖的直接投射，一方面满足了土耳其在西方专家的指导下构建市场经济体制的愿望，另一方面，美国的专家们也乐见土耳其的经济发展遵循西方所设定的标准、框架与道路。在致马歇尔的信中，胡佛研究所的工作人员表明，让土耳其学者在美国从事部分研究工作有着双重目的：一是让他们熟悉西方的研究方法，二是让他们体认到美国希望土耳其为世界所知。^③其背后的动机无非是希望土耳其知识界同样扮演西方的“好学生”角色，再将其作为可供效仿的模范推而广之。

^① E. Richard Brown, “Public Health in Imperialism: Early Rockefeller Programs at Home and Abroad”,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Vol. 66, No. 9, 1976, p. 902.

^② Edward Berman, *The Influence of the Carnegie, Ford, and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Ideology of Philanthropy*, pp. 79–83.

^③ “Eleanor Bisbee to John Marshall, 1 November 1954”, in RFA, Rockefeller Foundation Records, Projects, SG 1.2, Subseries 805 R, Box 10, Folder 97.

至于人文学科领域，基于东西方文明分野的考量更加引人注目，尤其是引入了“富有创造力的少数人”的概念。1951年，在赴中东部分国家考察后，马歇尔更加真切地体认到在这些以伊斯兰教为文化底色的国家，宗教在国家社会发展进程中挥之不去的深层作用力。在撰写的报告中，马歇尔提出，伊斯兰教已经不单单是一种宗教，更是近3亿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而西化改革实质上对这种生活方式造成了冲击，“在绝大多数穆斯林看来，西方化不只是对神学或思想体系的挑战，更是对社会和群体的挑战”。伊斯兰教与西方化之间存在冲突，“某种意义上代表了这些（中东）文化在西方化之前的样子。它仍然代表着他们文化中那些没有经历西方化的部分，这些部分现在作为一种保守力量面对日益增长的西方化。”^①在马歇尔看来，西方缺乏对于中东地区的客观认知，特别是无法理解伊斯兰教在当地民众社会生活中的独特作用。“如果不能更好地理解当代伊斯兰教，西方将继续误解近东并误判其行动。”^②不过，马歇尔还是乐观地认为，如果方法得当，伊斯兰教与伊斯兰世界就有可能从内部发生建设性改变，问题的关键在于由何种力量来引导这一改变的完成。

马歇尔借用了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关于“富有创造力的少数人”的概念，将其具体应用到穆斯林社会，马歇尔认为“富有创造力的少数人”这一群体包括学者、法律和医学领域的专业人士以及思想开明的穆斯林领袖。这一群体的“优势”在于其在穆斯林社会内部成长起来，但对西方的思想文化抱持着开放的态度，同大多数穆斯林领导者相比，他们更加期望而非惧怕中东地区和伊斯兰教的改变。他举例称，这一群体在面对现代社会同穆斯林身份之间出现的失调时，通过求助于威尔弗雷德·史密斯（Wilfred Cantwell Smith）教授所称的“更为个人化的宗教方式”，即苏非派神秘主义传统来加以化解。^③这一群体的规模还较小、影响力有限，但仍处于持续壮大之中。更为关键的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它（这一群体）代表了近东的大脑。如果脑力发挥作用，它似乎注定会继续赢得影响力，并越来越多

^① “John Marshall, Area Studies and the Near East, June 27, 1950”, <https://iif.rockarch.org/pdfs/6Nq7WwJfFwCe8oGnCDQBd>, 2024-07-01.

^② “John Marshall, The Near East 1951, 13 November 1951”, in RFA, *Rockefeller Foundation Record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and Policy*, SG 3.1, Series 911, Box 2, Folder 15, p. 4.

^③ “John Marshall, The Near East 1951, 13 November 1951”, p. 8.

地运用这种影响力。除非伊斯兰教的反西方势力控制整个近东地区，否则时间是站在西方这一边的。”^① 要想让绝大多数穆斯林亲近西方，就必须使其内部出现一个新的领导群体。毫无疑问，这一群体的唯一来源就在于“富有创造力的少数人”。富有创造力的关键少数人必须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阶层，或者说马歇尔所谓的大脑，从而引导相关国家内部发生变化，包括伊斯兰教本身的转变。由此马歇尔引出了一个要紧的症结：如何从外部鼓励和促进这一群体的成长及其领导作用的发挥。

马歇尔强调，首先，西方需要摒弃自视高人一等的姿态，克服普遍存在的优越感并弥补同理心的缺乏，还需要正视“富有创造力的少数人”所蕴含的引领社会变革的力量，使其发挥穿针引线之功用，尤其是不应低估、扼杀该地区本土知识界的话语和影响力。其次，归咎于殖民主义遗产，中东地区普遍对来自西方官方的援助存在怀疑态度，认为西方为这一地区和在这一地区所做的一切都是有“代价”的。哪怕是“富有创造力的少数人”对于来自西方国家政府的帮助也倾向于敬而远之。私人机构尤其是各类基金会反而能够发挥出人意料的重要作用。“近东与西方最愉快的关系是文化关系，在那里建立的西方学院和大学受到高度尊重就是证明……近东人似乎普遍觉得这些机构是西理解他们及其问题的前哨，与西方倾向于主导政治和经济关系的要求形成鲜明对比。”^② 马歇尔旨在为洛克菲勒基金会在中东地区资助活动的日渐活跃背书，凸显基金会在支持和影响“富有创造力的少数人”方面所具有的独到作用。最后，马歇尔对基金会如何最大化资助效益，总结了三大要点：其一，作为西方“未变现的资产”的“富有创造力的少数人”，这一群体的价值和能力需要在本土范围内得到更广泛的认可，基金会应当为此提供帮助。譬如，为贝鲁特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 of Beirut）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研究提供的小额资助，其对于解决近东一系列问题的贡献远远超过资助金额，针对这一区域其他高校的资助同样有望产生相似的收益。其二，重视资助与中东区域广大民众现状和面临的难题息息相关的研究。其三，对现今伊斯兰教思想和运动的研究给予特别的重视。

马歇尔认为“富有创造力的少数人”对于西方化有着自身的见解，因而

^① “John Marshall, The Near East 1951, 13 November 1951”, p. 10.

^② Ibid., p. 20.

鼓励这一群体对区域和本国问题深入思考、提出解决方案并加以实践。一方面，洛克菲勒基金会鼓励在西方的帮助下，“富有创造力的少数人”自主地对本国发展道路面临的难题开展研究，从而提升这一群体在国内外的学术影响力和胜任力，更好地服务于土耳其的西化发展道路。另一方面，这一模式也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为基金会在整个中东地区的资助活动树立标杆。马歇尔直言中东的现代化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现代化应当意味着一种植根于地区自身文化的发展，这些文化适应当今世界要求的进化”。在马歇尔眼中，中东各国的现代化工程并未达到这一要求，至多是片面的西方化，“对西方发展起来的实践和思维方式全盘接纳，而非选择性调适”。因而，这种“现代化”本质上同中东本土的思想和实践相异。^① 马歇尔主张的核心点在于“调和”，是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社群内部催生某种转变，进而与西方化更趋调和。这种调和最终的落脚点还是西方化，中东地区的现代化只能是西方化与本土的调适或者调和，就这个意义而言，中东区域的西方化避无可避，马歇尔关注的是如何使得这一进程更为积极和顺畅地推进，而非是否应走西方化道路的前置命题。这一拗口的解释过程也反映出以马歇尔为代表的西方人对中东现代化的猜疑和矛盾心理，更彰显美西方决策层深陷“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以维护西方利益和支配力为出发点，很大程度上罔顾非西方世界不同的文化制度和发展阶段等背景，盲目自信地推行西方制度和理念模式，从而造成了非西方世界西方化相当程度的水土不服。最终非西方世界仍须重新审视传统，重新摆放西方化和本土文化的关系，自主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三）重视西方化过程中如何正视伊斯兰教问题

部分土耳其国内外学者、基金会官员意识到土耳其民族国家构建工程肇始之际，便伴随着激进西化、否定传统社会文化认同带来的弊端，尤其是伊斯兰教与西方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如何让历史遗产同西方文化、价值观相互协调、相互促成，应是土耳其发展模式所亟需解决的问题。凯末尔主义者对宗教力量的打压是世俗化的、西化的发展道路选择的必然结果，然而伴随着战后政治体制的剧烈变革，诸多被否定、压制、漠视的可能性又重被提出、思考和诠释。伊斯兰教和西方化之间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认知，是事关国家

^① “John Marshall, Area Studies and the Near East, June 27, 1950”.

发展方向的关键问题之一，也是学者、政治家进行话语重构的问题之一。学者苏阿特·西纳诺卢（Suat Sinanoglu）在给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申请书中提出，凯末尔及其同道们非常了解伊斯兰教，并且体认到伊斯兰教与西方文明之间的矛盾；伴随着西方化成长起来的第二代政治家，如曼德列斯（Adnan Menderes）、卡瑟姆·居莱克（Kasım Gülek）等人对伊斯兰教知之甚少，仅仅观察到它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形式；而第三代政治家的认知就更为有限。

无独有偶，大卫·加伍德也认为土耳其现代化改革具有肤浅性，大多数土耳其精英既不了解本国的传统，也没有经历过充分的西方文明的熏陶。曾任罗伯特学院人文双语课程主任的杰弗里·刘易斯（Geoffrey Lewis）则批评那些“假装是西方人的东方人”既不了解西方思想史，同时也忽视了东方文明的成就，这样的心态会导致思想和文化上的身份危机，使个人与所生活的社会相疏离。^①总的来说，随着政治话语权的解冻，越来越多的土耳其知识分子认识到，凯末尔主义改革并没能处理好伊斯兰文化底色同以西方化、世俗化为基点的国家构建工程之间的关系，社会文化领域的西化着力不深、不实，为宗教在大众身份认同中的卷土重来留下了充裕的空间。上述观点同样引发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官员的共鸣，不论是对于奥斯曼帝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资助，还是罗伯特学院的人文通识课程，其题中之义就在于重新审视对奥斯曼帝国历史的定位，调整传统与现代的认知逻辑，展现东西方文明的共生共存之道。相比于单纯地站在西方立场上的“说教”，这种叙事范式无疑更利于展现西方良善、开放的一面，使得西方的思想文化更显“润物细无声”。正如有基金会官员所提出的主张：中东各地都出现了对避免外来文化偏见的课程的需求，但“该地区在提供综合教育体验方面作为很少甚至根本没有，这种教育体验可以帮助学生首先将自己置于该地区本身的传统中，然后再与很大程度上通过西方影响而实现的现代化联系起来。”^②

简言之，就是土耳其在了解自己过往的基础上，获得通往现代化这一独特道路的认知。当凯末尔主义者设计的西化发展道路经历数十年的前行似乎

^① Geoffrey L. Lewis, *The Bilingual, Bicultural Humanities Program at Robert College: An Address to Students, September 1959*, Istanbul: Robert College Research Center, 1960, pp. 6-7, quoted from Ali Erken,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John Marshal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ities in Modern Turkey: 1950-1965", p. 134.

^② "Robert College - General Education", in RFA, Rockefeller Foundation Records, Projects, SG 1.2, Subseries 805 R, Box 9, Folders 89-91.

硕果颇丰之时，一些学者和基金会官员们敏锐地察觉到，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西化工程潜伏着诸多暗流与逆流。因而基金会人文学部的目标不在于片面地强调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思想文化、价值观的全面铺开，而在于基于对历史遗产的深刻理解，鼓动土耳其本土的知识精英将一定程度上遭受人为压制的文化传统更好地同西方文化价值观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便于后者在这个文明特质迥异的国家更好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马歇尔所主张的“调和”之道意蕴深远。

综上所述，洛克菲勒基金会强调西方文明的内核就是科学和理性，可以借助医学、技术、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加以传播，进而引发对象国发生巨变，最终使其发生有利于美国的转变。至于这种转变何以发生，那就是，从外部施加一种自认为“明智”的推力，引发内部力量的启动，由此会催生内部诸多“有益”的变化。洛克菲勒基金会实践的内在逻辑还是建立在对西方现代化盲目自信基础之上，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对对象国本土文化的韧性，因而从外部施加的推力也容易因失去着力点而无力化。洛克菲勒基金会与美国其他基金会、商人集团和政府组织一道，致力于催生土耳其发生有利于美国的变化，使得土耳其成为西方化的样板，最终服务于美国谋求地区乃至全球霸权利益。然而，事实却证明，即便在激进西方化的土耳其，西方现代化模式也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

三 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土耳其项目的成效及限度

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土耳其的最终目标在于助力其在西方化道路上“行稳致远”，助力其成为伊斯兰世界吸收美国现代性和现代化内核的“模范生”与“桥头堡”。叙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法里德·泽尼丁（Farid Zeineddine）对此曾评价认为，与苏联相比，美国并没有明确的近东战略，所鼓吹的只是抽象的“美国生活方式”“民主”“自由的世界”等，这些往往可望而不可即。但也有例外，那就是土耳其。这些抽象的口号在土耳其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获利。^①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美国改造土耳其获得了一定成功。

^① “John Marshall, Fourth Annual Near East Conference”, <https://iif.rockarch.org/pdfs/Ws7acBxmeqE2n66kYSNGfp>, 2024 -07 -01.

（一）洛克菲勒基金会土耳其项目基本达到了预期目的

基金会对促进土耳其探索独特的发展道路亦有很大助力。洛克菲勒基金会围绕土耳其展开的资助活动，其目的就在于牢固地将土耳其锚定在“西方民主的大家庭”中，助力其摆脱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影响。冷战初期，土耳其成长为美国在中东坚定的盟友，就这一点而言，洛克菲勒基金会与美国其他机构协调配合，利用自身在文化教育领域渗透中的优势，部分地实现了既定目标。

具体而言，1929 年至 1967 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向土耳其的机构和个人提供了 115 笔资助，总额近 240 万美元。^①可以说，基金会为这 40 年间土耳其公共卫生、医疗教育、社会科学研究、人文学科的发展客观上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既包括一系列高校、科研院所、组织机构的从无到有、发展壮大，还包括一系列学术研究组织架构、研究范式、研究伦理与规范、基本理论方法的草创与完善，在基金会的大力资助下，包括中央卫生研究所、公共卫生学院等在内的机构的建立是土耳其公共卫生事业取得长足发展的标志性成就。阿齐兹（Aziz Küçük）在研究 20 世纪上半叶基金会针对土耳其医疗卫生领域资助活动的基础上，提出“基金会的最大贡献是确保土耳其的公共卫生按照科学管理原则构建，并与现代医学教育系统相协调”。^②从 1925 年到 1935 年，土耳其国内医生及护士人数的大幅增加，亦可视为上述举措助力下的成效：医生从 728 人增至 1 625 人，护士也增至 325 人。^③

基金会资助活动的成效还包括助推土耳其多种新旧艺术形式的推陈出新，如以芙蕾雅·科拉尔为代表的艺术家们得以走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获得更为广泛的艺术影响力。芙蕾雅不仅成为第一位在视觉艺术领域获得基金会奖学金的发展中国家候选人，还成功在美国举办了个人展览，赢得了媒体的广泛赞誉，《华盛顿邮报》称其“赋予古代艺术以现代风格”。^④芙蕾雅由此打

^① Kenneth W. Rose,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Fellowship Program in Turkey, 1925 – 1983”, p. 3.

^② Aziz Küçük, “Hayırsever Kapitalizmi ve Erken Cumhuriyet Döneminde Sağlık Hizmetlerinin Örgütlenmesi: Rockefeller Vakfının Rolü”, *Amme Idaresi Dergisi*, Cilt 51, Sayı 2, 2018, s. 111.

^③ Umut Karabulut, “Cumhuriyet’in İlk Yıllarında Sağlık Hizmetlerine Toplu Bir Bakış, Dr. Refik Saydam’ın Sağlık Bakanlığı ve Hizmetleri (1925 – 1937)”, *Çağdaş Türkiye Tarihi Araştırmaları Dergisi*, Cilt 6, Sayı 15, 2007, s. 153.

^④ Muriel Bowen, “Turkey’s Leading Ceramicist: She Gives Ancient Art a Modern Style”, *Washington Post and Times – Herald*, May 12, 1957, F13.

开进入美国市场的大门。此外，一大批土耳其医技人员、专业研究人员、学者、艺术从业者、政治人物等在基金会的帮助、影响下，实现了自身职业追求。其中不乏据有各行各业之显要职位者。譬如，曾任土耳其总理的比伦特·埃杰维特（Bülent Ecevit）于1957年获得基金会奖学金资助赴哈佛大学进修，20世纪50年代任共和人民党秘书长的卡瑟姆·居莱克也在1931年得到基金会资助在剑桥大学等欧洲名校研修经济学。受到资助的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亦不在少数。这些政要、学术大家对于基金会的肯定一定程度上证明了基金会紧盯关键少数人，对初露头角的青年人才青眼有加的政策独具慧眼，同时也表明基金会以这些有希望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取得重要地位的人为基点，向这一国家渗透美国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构想并非虚妄之谈。与此相关的另外一组数据是，1925~1983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共资助155名土耳其人出国深造，大部分人的学习地是美国。^①对于政治家和杰出学者的资助，充分体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高端化和专业化，以文明之名、行改造之实的理想化色彩也非常浓厚，体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极强的文化渗透力。

洛克菲勒基金会围绕土耳其的资助可以说是双管齐下，既支持美国的土耳其研究，也支持土耳其自身的公共卫生、医学教育、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发展，目标都是促进土耳其对西方文明因子的吸收。基金会也特别重视对于伊斯兰教的研究，声称将为学生提供关于伊斯兰教的系统和科学的知识、伊斯兰教的建制、表达方式和历史，以便以同情之理解来认识其价值和意义，实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的相互理解。这一逻辑并不完整，还需要加上在理解伊斯兰教基础上对其加以改造。这种诊断式的反思目标是为了改变，改变的方向就是西方化在土耳其的落地生根，这一目标只能说是部分和暂时地达成了，后续还会有多次反复。

洛克菲勒基金会虽然在资助实践中强调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相互理解，但还是潜藏着自视为师的、傲慢的深层逻辑。基金会成功地协调了自身的两大使命：作为促进科学进步和“人类福祉”的国际主义慈善组织和作为推动美国霸权的冷战机构。借由知识的“赠予”，基金会在扮演着西方式或美国式现代化的代理人或赞助人，由此观之，“进步主义和帝国主义是齐头并进的”。^②基金

^① Kenneth W. Rose,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Fellowship Program in Turkey, 1925 - 1983", p. 3.

^② Inderjeet Parmar, *Foundations of the American Century: The Ford, Carnegie, and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in the Rise of American Pow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66.

会相信，假以时日一系列资助实践必然会提供某种丰厚的回报，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美国霸权生长过程中的特殊作用。

（二）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土耳其项目遭遇了诸多难题

在诸多成功案例的另一面则是众多未能达成预期目标的项目计划，乃至胎死腹中的设想，如上文提及的基金会选拔优秀青年人才赴英国和美国大学深造，学成后担任罗伯特学院教职人员的计划。截至1967年1月，该计划共招收了18名参与者，但只有5人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7人仍在研修，而6人在获得学位之前就已退学。^① 罗伯特学院引以为傲的人文通识课程同样在实践过程中不尽如人意，课程文本在让学生深入了解西方文明和现代思想方面较为完备，而涉及伊斯兰教和奥斯曼帝国历史文化的内容却难以达到同等的高度与深度，“最终，它让土耳其学生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文化的承诺只得到了部分兑现”。^②

除此之外，以奖学金形式发放的资助，其对获得者实际产生的效用因各种制约因素而大打折扣的情况亦非孤例。语言隔阂、水土不服和生活成本是其中最主要的几大问题。例如，1962年，一位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向基金会顾问反映道，“适应新环境并不容易。公共交通很差”，他的公寓离学校有5英里远，别无他法，只能购买一辆二手汽车，而这大大增加了他的生活成本。虽然洛克菲勒基金会致力于通过多种方式为奖学金获得者提供便利，但还是不可避免地存在多方掣肘的情况。1961年之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失去了资助人文学科的兴趣，主要的注意力转向了农业。进入70年代，随着洛克菲勒基金会全球资助理念与实践的大幅调整，以及土美关系蜜月期的戛然而止，基金会在土耳其的活动亦渐趋减弱，对农业科学领域的资助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医疗教育、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项目，七八十年代土耳其人获得的所有奖学金资助都流向了前者。

土耳其知识分子对来自他国的各类资助活动、项目的态度同样莫衷一是，深层次反映的还是西方化水土不服的问题。例如，在亚洛瓦会议计划邀请的人员名单中，素来与约翰·马歇尔交好的著名知识分子阿德南·阿德瓦

^① Murat Erdem and Kenneth W. Rose, “American Philanthropy in Republican Turkey: The Rockefeller and Ford Foundations”, p. 140.

^② Ali Erken,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John Marshal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ities in Modern Turkey: 1950–1965”, p. 136.

(Adnan Adivar) 却最终拒绝了邀请, 理由是不愿在他国的资助下行事。^① 而在会议举办过程中, 关于“乡村形态、物质及意识形态文化研究”这一选题是否需要洛克菲勒基金会邀请两名外国专家同土耳其本土学者一道展开研究也出现了分歧。

归根结底, 洛克菲勒基金会围绕土耳其展开的资助活动是两国政治、知识精英战略利益一致性的结果, 立足的基点在于对现代化发展道路认知、摹画、践行的趋同性, 烘托出的是美国国际地位与影响力的历史性跃迁、冷战初期全球战略的四面出击, 以及土耳其西化发展道路的奠基与偏折。西方文明的内核可以借助医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加以传播, 其根本是宣扬“自由政体”, 需要对象国向美国模式靠拢。西方居于世界权力之巅, 西方文明具有压倒性的优势, 秉持“文明中心论”, 向世界其他区域施加革命性的改变, 以文明之名、行改造之实, 服务于自身国家利益。然而, 随着受援国民众主体意识的生长, 随着双方对国家发展道路认知的异逐渐大于同, 基金会所立足的基点随之也就逐步消失。

四 结语

洛克菲勒基金会从民众最容易认可和获益的医疗卫生领域着手, 进而切入关系到民众基本认知和世界观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其基本目标还在于土耳其能够坚持亲西方的道路选择, 继而将土耳其建设成为西方改造伊斯兰世界成功的模板。改变的基本方式还在于对精英用力, 借助于土耳其精英的力量实现更大范围的改变, 与此同时, 洛克菲勒基金会也注重美国本土土耳其研究力量的壮大, 以便深化对于土耳其的认知。基金会尤以“培训专业领导力”为重, 实质则是扶植与基金会背后的美国精英集团共享相似世界观和国家利益观的第三世界精英, 从而构建一个符合美国利益的世界。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活动将世界作为其舞台, 资助的范围和项目不断调整, 以期很好地服务于美国的利益。基金会以幕后玩家的身份助力美国冷战中的斗争, 其基本的定位还是以西方的文明, 尤其是美国的文明改造世界,

^① “John Marshall’s Diary, July 28, 1953”, in RFA, *Rockefeller Foundation Records*, Projects, SG 1.2, Subseries 805 R, Box 9, Folder 96.

改造的核心方式就是在世界范围内推动西方化，在此过程中输出了西方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推动对象国主动改变。在这个意义上讲，基金会属于美国外交工具的重要组成部分，简单地视其独立于政府并不准确。应该说，洛克菲勒基金会既雄心勃勃，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土耳其到 20 世纪 50 ~ 60 年代现代化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而且坚定地将自身圈定在西方阵营之中，洛克菲勒基金会则属于来自美国的众多作用于土耳其现代化的合力之一。显然，美国以文明的名义推动土耳其的改变，取得了一定成效，尤其是很大程度上培育了土耳其人对美国的好感，将土耳其锁定在西方阵营之中。全球权力体系中居于最高端的位次决定了美国可以通过学术捐赠这种隐匿的方式，吸引对象国的精英来传播美国的价值和理念。

然而，土耳其终究还是要面对自身传统和移植而来的现代化之间的紧张，终究还是要不断调整其对文明的认识，调整西方化的道路选择 and 一味追随西方的外交政策。尽管基金会对于传统的影响力也有过较为客观的评价，体认到“西方关于伊斯兰教当代思潮的理解与该宗教的重要性远远不成比例，伊斯兰教构成了 3.5 亿人的生活方式”，理解伊斯兰教何以呈现当下的情势对于理解中东具有基础性意义。^① 然而，这种改造终究难以突破文化主体性的障壁，土耳其在推进现代化进程中还是意识到了文明的多样性，且在这种多样性中，土耳其特性和伊斯兰文化占据了重要地位；土耳其还是要重新调整其现代化道路，这种道路是现代性与土耳其传统文化的相互调适。换言之，简单的改造并不能够消除传统的力量，其成效必然具有短暂性特征，最终不仅土耳其西方化的发展道路遭遇了曲折和回潮，甚至土耳其国内部分改造的实施者也沦为了被改造的对象。美国基金会难以实现其“宏愿”，不仅在于其设定的目标大而不当，更在于受援国家和民众主体意识的成长。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①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nual Report 1951”, pp. 394 - 395.

spillover effects of the new round of the Israeli – Palestinian conflict. Iran’s resistance strategy is fundamentally based on maintaining national security rather than exporting revolutionary ideology, adopting a defensive posture rather than offensive stance, using anti – American and anti – Israeli stances as a unifying force, and employing missile deterrence as a key tool. Following the outbreak of the new round of the Israeli – Palestinian conflict in 2023, Iran and its resistance front suffered military strikes from Israel and the United States, resulting in a major setback for its resistance strategy. This wa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severe damage to the resistance network, a significant weakening of its domestic foundation, and a severe compression of its strategic space. The reasons for this setback are threefold: first, Iran’s economic strength is insufficient to support its vast resistance strategic network; second, domestic political maneuvering leads to its wavering between resistance and de – escalation, preventing it from fully implementing its deterrence strategy; and third, the long – term weakening efforts of the US and Israel, along with their repeated breaches of moral boundaries, have given them the upper hand. This setback will have many profound impacts on the regional order: first, it will lead to a new round of regional power fragment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second, it will further undermine regional rules and norms; and third, the regional agenda structure will undergo new adjustments. The resistance strategy is a crucial component of Ira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nd its setback could intensify to a severe systematic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risis in Iran. If such a scenario occurs, the geopolitical landscape of West Asia and Central Asia could become even more complex.

Key words: Iran’s geostrategy; the Shiite Crescent; the new round of Palestinian – Israeli conflict; the Middle East regional order; deterrence theory

The Deep Logic and Essence of U. S. Aid to the Middle East: A Case Study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Funding Projects in Türkiye

Li Bingzhong & Liu Jiang

Abstract: Foundations have been important tools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expand its

influence globally, among which,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has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helping the United States establish global hegemony. Behind its powerful capacity for cultural penetration lies its deep promotion for Western civilization along with a clear demarcation between “highlands” and “lowlands” of civilizations.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60s, the logic behind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s funding of projects related to Türkiye was based on the belief that shaping a Türkiye loyal to the West requires a complete understanding of Turkish culture, especially Islam. The fundamental strategy for change was to promote the American way of life and values, primarily by funding the “creative minority”, in the hope of making the key minority become the leaders who could guide the “impregnable majority”. Rooted in the belief of “superiority of Western civilizations”, in the name of civilization, it aimed at the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The ultimate goal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is to solidify Türkiye’s Westernized development path, consolidate its loyalty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allies, and ultimately safeguard the global hegemonic interests of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funding direction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largely aligned with the established development path of Türkiye, its efforts achieved certain degree of success. However, the diversity and traditions of Middle Eastern civilizations have a profound social foundation, which means that Türkiye’s modernization must be based on its own traditions. This, at the deep level, determines the limitations and short – lived nature of the Türkiye projects funded by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aid; Rockefeller Found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ürkiye projects; social science; humanities; “Theory of Civilizational Superiority”; path to modernization

**Formation of Desires, Activation of Beliefs and Engagement with Opportunities:
An Analysis of the Behavioral Mechanisms of Qatar’s Foreign Aid**

Li Yi & Zheng Zhaochen

Abstract: Foreign aid serves as a crucial instrument within Qatar’s diplomatic